

三线建设对推动新时代产业布局跃升的启示

骆宏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 我国在2024年7月提出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是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and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举措，是推动新时代产业布局跃升的关键一招。20世纪60年代，为了应对国际周边紧张局势，我国开展了大规模三线建设，投入了巨大的人财物等资源，建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使得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迅速成长为国际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一员。当前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深入研究和借鉴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推动产业布局加快优化调整。

关 键 词： 三线建设；产业布局；新质生产力；跃升

The Enlightenment of Three-Line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the Leap of Industrial Layout in the New Era

Luo 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00

Abstract： In July 2024, China proposed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c hinterland and backup of key industries, and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which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a key move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 layout in the new era. In the 1960s of the last century,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urrounding tensions, China carried out a large-scale three-line construction, invested huge resources such as people and property, and built a relatively complete industrial system, making the poor and white new China rapidly grow into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stage. At present,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depth study an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layout.

Keywords： three-line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layou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leap

2024年7月，我国在《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要求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1]。这不是简单地复制建设，更应该是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牵引，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劳动三要素，形成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工业体系作为生产力的核心，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建国后主要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建设，第一次是新中国初期的156项工程建设，第二次是三线建设，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后工业全面快速提升。三次工业体系建设鳞次推进、环环相扣、缺一不可。随着向工业4.0迈进，更加注重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三线建设已经逐渐被逐渐淡忘，但是三线建设作为我国建国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工业体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一、三线建设的基本内涵及特点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结合当时周边局势和我国经济地理特征，将我国划分了三条线，第一条就是我国的沿海和边疆地区，第二条线就是东部与西部之间的中部地区，第三条线就是西南西北等内陆地区。三线建设不是单单第三条线的建设，而是围绕以上三条线开展建设的。

三线建设的完整说法应该是“大三线”建设和“小三线”建设，大家习惯将他们合在一起统称为“三线”建设。“大三线”

建设和“小三线”建设的区分主要是依靠经济地域特点进行划分的，“大三线”主要以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西南和西北地区为主，“小三线”主要是指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腹地为主。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来说，三线建设是一项由政府投资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工程，是人、财、物、技术等资源在政府的计划指令下进行的全国资源优化配置，其不同于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体的方式，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方向性、结构性等特点，有效规避了市场调节的有限性、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弱点。在三线建设过程中，也孕育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

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2]。

二、三线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对三线建设的评论褒贬不一，有的说失大于得，有的说得大于失，有的说有得有失，这些评论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从已公开的官方资料来看，1991年我国中央政府就曾得出结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要理解三线建设是否正确，就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系统思维去分析，要用战略的眼光来看待，而不是将历史环境割裂开来，以当前的视角孤零零地去评价。虽然三线建设后期受到错误路线等干扰，出现部分工程半途而废、部分项目过急过快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过分强调战备远离城市造成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增加等情况^[3]，但是总体说来，三线建设大方向正确^[4]，有效应对了当时国际严峻形势，取得了伟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效益。

（一）坚持问题导向，三线建设是充分应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必然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社会意识不会凭空产生。“一五”期间，基于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我国工业建设得到大量援助，但是随着霸权主义抬头，20世纪60年代，援建方撤回援建专家，并在国际社会上攻击新中国，甚至挑起矛盾，诱发了一系列不良事件和局部冲突等，导致双方关系处于异常紧张。在西南方面，不仅国内局势非常紧张，与周边邻国也发生摩擦冲突。

总体上来说，由于新中国刚建国不久，各项基础工业百废待兴，更谈不上产业布局优化的问题，更多的是实现0到1的突破，要解决工业体系有没有的问题，而不是优不优的问题，工业发展不起来，经济发展就缺乏动力，就不能有效应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严峻的形势，因此，我国政府要充分考虑各种可能风险以及应对措施，就必须从建立健全工业体系入手。

（二）坚持战略导向，三线建设是推进落实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追赶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必要举措

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是总结提炼中国实际国情得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发展策略，积极建设工业体系发展国内经济，不走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为应对外部不利因素，就需要让原先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工厂、研究所、院校在内陆地区建设自己的战略后方，带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分工是文明的起点”^[5]。从本质上来说，工业是社会专业化分工的集中体现，社会分工越细，技术发展就越快，专业化程度越高，生产效率就越高。中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错失良机。紧随其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带动了经济全球化更快发展，从机械化、电气化到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始终处于缺席或者落后状态，一直在小农经济、小手工业经济中停滞不前。中国要想在复杂严峻的局势中实现工业的追赶超越，就必须立足国内市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三）坚持结果导向，三线建设是国内工业体系布局再调整再优化的有利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业体系从建国时的一穷二白到1960年底已初具规模。“一五”期间启动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已建成133项，其余仍在建设中，计划投资187.8亿元。实际完成196.3亿元，完成率104.5%。在“一五”“二五”建设期间，国家就重点考虑了工业布局问题，将部分工厂迁移或建设在距离原材料地区较近的内地，推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改善交通状况和经济发展，推进内地工业化进程，平衡东西部协调发展。“一五”期间，中央向西部投资比东部高出6个百分点，156项重点工程，中部和西部地区占到了60%以上。

“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在陕西落户了26项，直接奠定了陕西的工业基石，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之前陕西“一穷二白”“手无寸铁”的落后面貌，陕西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一五”期间由不到15%提高到40%^[6]。西安当时受益最大，建设了东郊纺织城、西郊电工城、南郊文教城、北郊阎良航空城，经济溢出、人才聚集效应十分明显，直接带动了西安经济发展，自从建设了17项工程后，西安就成为了我国的工业重镇，60多年来经济总量始终稳居西北地区首位。两个五年规划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开展大规模三线建设储备了一定的人才、技术、资金等基础。

我国中央政府带领各级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配人、财、物，发动全国各省和人民群众力量，开展了举世瞩目的三线建设，基本建立了一套门类齐全、专业完善的备份工业体系。事实也证明了，三线建设对我国建立较为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和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三线建设安排项目1100多个，总投资超过2000亿元^[7]，最高峰时同时投入400多万人，到20世纪70年代末，三线地区工业固定资产超过了1500亿元，比三线建设前增加了4倍多，约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三分之一，其中国防工业各项指标已经超过一线二线城市^[8]，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9]。

三、三线建设对新时代产业布局优化调整的几点启示

在当时人才、技术、经济、资源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三线建设构建了更加完备、更大规模的工业产业体系，形成了独立自主、完全可控的科技创新体系，支撑了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够实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成就，笔者认为，核心在于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主要特征是独立自主，本质是产业布局再优化。

（一）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发挥举国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是三线建设成功的关键核心所在

经济从来离不开政治，宏观经济学从核心上来看是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更是受到各项宏观政策影响。因此，要发展宏观经济，就需要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也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央政府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完成两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了

经济建设伟大成就。中国中央政府带领广大的人民群众过上了当家作主的生活，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澎湃、斗志昂扬。同时，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央政府能够有效调动全国人财物等各项资源，通过加大资源投入，在短短三年里面，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历史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拥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我们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实现产业布局跃升的根本所在和组织保障。

（二）坚持独立自主发展路径，巩固、优化、提升工业产业体系，是三线建设的最主要特征

156项重点工程建设，离不开外部专家的有力援助，但是三线建设却是我国独立自主开展的大规模工业体系扩增和备份建设。三线建设时期的独立自主，是积极应对国际不利环境的主动举措。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等各种不利条件下，政府各级人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部队官兵等上下齐心，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从区域布局规划、工业选址、建筑设计、施工建设到生产线布局，从基础研究、产品研发、工艺保障到产品制造，从学习模仿先进技术到消化吸收再创新，先后建成了川黔、成昆、襄渝等10条铁路，建成了葛洲坝等大中型水电站68座，建成了攀枝花、酒泉等钢铁工业企业984家等等，从交通、电力、基础工业等不同领域进行综合开发建设，在156项重点工程建设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庞大的工业体系，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对部分重要产业进行易地搬迁等布局调整^[10]。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严峻国际形势，面对霸权国家的高新技术封锁和长臂管辖，我国更要坚持独立自主发展，不能寄希望通过购买高端先进装备和技术来实现自我发展，往往最前沿高端的装备和技术是买不来的，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更要依靠自身艰苦奋斗，在价值链上找准高端定位，在产业

链上选择合适的切入点，在技术创新链上实现产品研发、工艺制造、市场商业模式、数字技术应用等关键突破，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优势。

（三）基于区域资源禀赋，推动布局再平衡再优化，统筹全域协调发展，是三线建设结果的本质内核

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三线建设的最初目的是应对外部不利形势开展的工业建设，在内陆地区实现工业体系备份，以三线建设的基础工业等作为资源保障，服务国家发展和人民需要。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通过大量三项建设，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兵器工业基地，生产能力占了全国的一半；四川、贵州、陕西等建立起了电子工业和核工业科研基础，形成了完整的核工业体系；陕西、贵州、四川、湖北等建立起了航空、航天、船舶等科研工业基地，生产能力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二^[11]。无论从建设的最初目的，还是从三线建设结果来看，均极大地调整了东部、中部、西部工业体系布局，将建国初期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东南沿海等地，重新布局到陕西、甘肃、山西、湖北、四川、贵州等，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也改变了新中国工业体系主要依靠一线、二线的情况，推动了我国工业现代化建设。当前，我国要加快新时代产业布局调整和优化升级，就不能照搬照抄既有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范式，而要遵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承认资源的稀缺性，在资源配置约束条件下，正确处理资源分配、经济增长和系统配置的关系，根据各地人口和资源禀赋，优化投资布局和产业布局，统筹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实现技术、资本、人力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形成新的产业体系和新的经济模式。

参考文献

[1]《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2]周海燕、吴晓萍，《战备时期的工业建设—三线建设口述实录（1964—1980）》[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23年9月。

[3]何金铭、赵炳章，《当代陕西简史：1949—1995》，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12月。

[4]李悦，《产业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

[5]亚当·斯密，著，高格，译，《国富论》[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7年1月。

[6]桂维民，《国家156项工程在陕企业纪实》[M]，陕西，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

[7]刘世庆，《国防科技工业的布局和发展战略转型》[J]，四川：《经济体制改革》，2006（6）。

[8]《三线建设：艰难时期的国家创业》，<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21/0319/c437127-32055903.html>

[9][美]托德·桑德勒，[英]基思·哈特利，著；姜鲁鸣、罗永光，译，《国防经济学》，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

[10]李彩华，《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历史考察》[J]，北京：《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3）。

[11]宋毅军，《关于三线建设国防经济发展战略决策的得大于失》，<https://www.cnki.net>。